

# 《新青年》创刊与中国近代的文化走向

郑大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836)

[关键词] 新青年;中国近代;文化走向

[摘要] 《新青年》的创刊既是中国近代文化走向的必然产物,同时又对中国近代文化走向产生过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概而言之,中国近代的文化走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封闭走向开放;二是从一元走向多元;三是从传统走向现代。从鸦片战争时期非常有限度的开放,到洋务运动时期开放的扩大,再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放的进一步扩大,最后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全面开放,这就是中国文化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全过程。没有中国文化自鸦片战争时期开始的从封闭走向开放,就不可能有《新青年》的创刊,而《新青年》的创刊,又对中国文化进一步走向开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图分类号] K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2826(2015)08-0006-08

100年前的9月15日,《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自第2卷起,改名为《新青年》。《新青年》的创刊既是中国近代文化走向的必然产物,同时又对中国近代文化走向产生过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概而言之,中国近代的文化走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封闭走向开放;二是从一元走向多元;三是从传统走向现代。

## 一、从封闭走向开放

中国文化本来是开放型的文化,如汉唐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佛教的传入及与中国文化的融合,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的来华,等等,这也是中国文化能长期兴盛不衰、综合国力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自18世纪初清政府实行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后,中国文化断绝了与外来文化之间的一切联系,开始成为封闭的文化系

统。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对中国周边以外的外部世界很少关心和了解,尤其是对远离中国上万里的“西方”更是知之甚少,那时谈世界,谈西方,颇有些“海客谈瀛洲”的味道。比如,道光二年(1822年)由当时著名学者阮元主持修撰的《广东通志》,就把英吉利当成“荷兰属国”,说它“悬三岛于吝因、黄祁、荷兰、法兰西四国之间”,又说法国是“初入佛教,后奉天主教”。<sup>[1](P450)</sup>道光十八年(1838年)修的《粤海关志》卷二十三,因读音相近误把东南亚小国丁机宜(为爪哇属国,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英得腊其利一带)当成英吉利。就是到了鸦片战争爆发后,清廷上下虽“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道光皇帝不知英国的地理位置,有无陆路可通,以及是否与俄罗斯接壤。耆英说英人夜间目光昏暗,分不清东南西北。黄惠田认为英地黑暗,不敢燃火,船行半月始见天日。当时中国人

[收稿日期] 2015-06-05

[作者简介] 郑大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

对于外部世界的茫然无知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文化从封闭走向开放,肇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1839年,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到广州查禁鸦片。他到达广州不久,为了解“夷情”,以便“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便组织人翻译《四洲志》,成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继林则徐之后,“开眼看世界”的还有魏源、姚莹、徐继畲等,他们著书立说,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知识,尤其是西方的物质文明、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从而使长期生活在与世隔绝状况下的中国人对外部世界有了一定了解,知道了世界上有五大洲、四大洋,有一百多个国家,中国只是这一百多个国家中的一个,知道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和现状。

当然,鸦片战争前后中国文化从封闭走向开放的程度还十分有限,这不仅表现在当时“开眼看世界”者还凤毛麟角,人数很少。据统计,从1840年起至1861年止,写成的有关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书籍只有22种,<sup>[2](P172)</sup>而且还表现在当时的社会舆论对魏源、徐继畲等人“开眼看世界”的批评和攻讦。徐继畲的《瀛寰志略》“甫经付梓,即腾谤议”。<sup>[3](P192)</sup>史策先说《瀛寰志略》“张外夷之焰,损中国之威灵”,本想上章弹劾,旋知同事已捷足先登,方才罢休。<sup>[4](P219)</sup>李慈铭攻击《瀛寰志略》“轻信夷书,动辄铺张扬厉”。“于华盛顿赞其以三尺剑取国而不私有,直为环宇第一流人,于英吉利尤称其雄富强大,谓其版宇直接前后藏。似一意为泰西声势者,轻重失伦,尤伤国体。”<sup>[5](P480-481)</sup>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开眼看世界”的书籍并没有得到国人应有的关注,发挥它们应该发挥的作用。《海国图志》1852年出了百卷本后,到1867年之前,没有再重印过;《瀛寰志略》于1848年问世后,也只由红杏山房于1850年重印过一次,而且数量非常有限。

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再次惨败,到了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文化从封闭走向开放的程度有了扩大。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在“制洋器”、“采西学”,“求强”、“求富”的同时,还先后开办了33所洋务学堂,官派8批196名留学生到美、德、英、法等国学习,并成立了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等译书机构,积极组织人翻译“西学”书

籍。据英人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记载,从1871—1880年的10年间,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翻译的西书就有98种,235册,译成未刊之书45种,140余册,尚有13种未全部译完,其数量远超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翻译西书之总和。随着“西学”传入的扩大,人们对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与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相比,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文化从封闭走向开放的程度虽然有了扩大,但总的来看还是非常有限的。由于洋务派接纳“西学”的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因此,洋务时期的文化开放主要限于物质文明或科学技术方面,这可以从洋务时期出版“西书”的类别看出。据研究者统计,1860—1900年40年间,共出版各种“西书”555种,其中自然科学162种,占总数的29%,应用科学225种,占总数的41%,两者合计387种,占总数的70%,而社会科学只有123种,占总数的22%,其他45种,占总数的8%。<sup>[6](P11-12)</sup>与此同时,尽管洋务时期的文化开放主要限于物质文明或科学技术方面,根本没有触及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但在以大学士倭仁为代表的一些顽固派看来,这也有悖于“祖宗成法”和“圣人古训”。于是他们群起而攻之。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只不过在日记中如实地记下了自己在国外的所见所闻和感想,承认西方文明有超过中国的地方,便遭到顽固派的攻击,日记不仅被奉旨毁版,他死去数年之后,还有人要求朝廷下令将其“掘墓戮尸,以谢天下”。郑观应在谈到当时的社会风气时说:“今之自命正人者,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sup>[7](P272)</sup>

当历史进入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的相继惨败,人们认识到,要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挽救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就必须进一步改革开放,不仅要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或科学技术,而且还要学习西方的制度文明,变中国的封建主义专制制度为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于是中国文化从封闭走向开放的程度有了进一步的扩大。以“西书”的出版为例:除自然科学外,这一时期社会科学的书籍日益增多起来。从《译书经眼录》所收

的书目可以看出。《译书经眼录》收1900—1904年所译书目491部,其中,自然科学164部,占总数的33.4%,社会科学327部,占总数的66.6%。另据《日本译中国书综合目录》一书的统计,从1868—1895年,中译日文书8种,几乎全是自然科学,1896—1911年中译日文书共958种,其中,自然科学(含应用科学)172种,约占总数的18%,社会科学786种,约占总数的82%。这些社会科学著作虽然包括了哲学、历史、法学、文学、经济、政治、社会学等学科,但主要以政治和法学类为主。熊月之在研究了20世纪初“西学从东方涌来”后指出:当时中国人翻译来自日本的西书,“法学、政治学方面,译作最多,成效最大”。<sup>[6](P658)</sup> 个中原因,可以从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20世纪初的预备立宪和辛亥革命的现实需要中去寻找。与此同时,和文化开放相关联的报刊业、新式教育、新知识分子群体等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以报刊业为例,据徐松荣的研究,“1898年到1911年,国内先后创办的比较知名的报刊达200种以上。其中上海最多,达80种以上,杂志多于日报;其次是北京、广州、武汉、天津、长沙,北京、广州都在30种以上”。<sup>[8](P166)</sup> 民国初年,全国的报刊有500多种,“仅1912年2月以后,到北京民政部进行登记,要求创办的报纸就达90多种”。<sup>[9](P676)</sup>

《新青年》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创刊的。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中,向青年提出了六条要求,其中第四条即是“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他号召中国青年要有世界知识,要认识到“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立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sup>[10](P7)</sup> 从而推动中国文化的进一步开放。也正是以《新青年》的创刊为起点,中国文化加快了它的开放进程。以西学传播为例,如果说洋务运动时期传播的主要是西学中的自然科学,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以“政学”亦即社会科学为主的话,那么,自《新青年》创刊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几乎所有的西学门类,如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哲学、宗教、心理学、地理学、史学、文学、美学、语言、文字、艺术、科技、医学、教育,以及各种各样的主义、思潮、学说、观念、理论都先后传入到了中国。比如,西方哲学虽然自戊

戌变法时期起就已开始传入我国,但真正对西方哲学进行全面系统的介绍,则是在新文化运动及其之后。“这一时期学术界对西方哲学的输入,较之以前,有两个极为显著的特点。这就是:第一,规模宏大,西方哲学的所有流派,几乎于同一时期一并涌入中国;第二,全面系统,超出了以往零星稗贩式的介绍。”<sup>[11](430)</sup> 艾思奇就曾指出:“在清政府崩溃以前,即有种种的自由思想之输入,严复的翻译,《新民丛报》等类出版物之介绍,虽然谈不上哲学,至少可以作为资本主义新型思想之最初的具体表现。……但资本主义型思想之突飞猛进的成长及新哲学思潮的正式成立,是在民国三年以后五四运动中的事。”<sup>[12](P57)</sup>

从鸦片战争时期非常有限的开放,到洋务运动时期开放的扩大,再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放的进一步扩大,最后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全面开放,这就是中国文化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全过程。《新青年》的创刊既是中国文化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必然产物,又对中国文化进一步走向开放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 二、从一元走向多元

近代以前的中国文化是一元的,而非多元的。因为近代以前,中国只存在着一种文化,即中国的本土文化,而没有其他性质的文化存在,虽然在汉、唐时期曾有外来的印度佛教的传入,但外来的印度佛教传入不久即与中国的本土文化实现了融合,而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这也是我们经常将儒(儒家)、释(佛教)、道(道家或道教)三家相提并论的重要原因。当然,我们说近代以前的中国文化是一元的文化,并不否认在中国文化内部存在着不同的文化派别和思想,如我们上面提到的儒、释、道,但在这些不同的文化派别和思想中儒家处于独尊的地位。

与从封闭走向开放一样,中国文化从一元走向多元也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开始的。但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传入的西方文化还十分有限,没有对中国文化的一元结构产生什么影响。真正影响到中国文化一元结构的是洋务运动时期西方文化的传入。但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并不认为西方文化的传入改变了

中国文化的一元结构。因为在他们看来,当时所传入的西方文化,不是与中国文化异质的外来文化,而是中国古代文化传到西方之后的回归,换言之,西方文化源自中国。这就是在洋务运动时期颇为流行的“西学中源”说。1867年,恭亲王奕訢奏请在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招考正途出身人员入馆学习时,宣称西方的天文算学源自中国的古学,是“东来法”,是中国的学问。先后出任过浙江、广东按察使和湖北布政使的王之春为提倡西学,推行洋务,在《广学校》一文中把西方的文字、天文、历算、化学、汽学、电学、机械等,都说成是在中国发其端,“泰西智士从而推衍其绪,而精理名言、奇技淫巧,本不能出中国载籍之外。”<sup>[13](P513)</sup>就是号称精通西学的王韬在《原学》中也认为,中国作为“天下之宗邦”,“不独为文字之始祖,即礼乐制度、天算器艺,无不由中国而流传及外。”他一一举出数学、乐器、船舰、指南针、霹雳炮、测开仪器、语言文学等,说这些都是“由东而西,渐被而然”的。郑观应引《周礼》、《墨经》、《亢仓子》、《关尹子》、《淮南子》等书的有关记载,证明西方的数学、化学、重学、光学、气学、电学均出自中国,皆“我所固有者也”。<sup>[7](P275)</sup>

洋务派之所以认同“西学中源”说,否认西方文化的传入改变了中国文化的一元结构,其原因就在于这一学说能够解决洋务派所遇到的一个最大的思想或理论难题,即他们主张“制洋器”、“采西学”,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否是“以夷变夏”。众所周知,“夷夏之辨”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最基本的价值观念之一,它犹如恢恢法网,严重地束缚着绝大多数士人的思想。当时以倭仁为代表的顽固派反对洋务派“制洋器”、“采西学”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认为西方文化是外来的“夷人”文化,中国学习西方文化是“以夷变夏”,违背了“以夏变夷”这一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最基本的价值观念。这也是他们之所以能够获得不少社会舆论的支持,从而给洋务运动造成极大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洋务派要反驳顽固派,获得士人对洋务运动的理解和同情,就必须证明“制洋器”、“采西学”,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并不是“以夷变夏”,而是中国的本来之学。

“西学中源”说则解决了洋务派所遇到的这一难题:学习西方文化不是“以夷变夏”,而是“礼失而求诸野”,是学习中土久已失传的中国古学,它并不会也不可能改变中国文化的一元结构。

尽管洋务派否认西方文化的传入改变了中国文化的一元结构,但西方文化的传入改变了中国文化的一元结构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文化的进一步传入,中国文化的一元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首先,是西方的思想观念的传入,如“自由”、“民主”、“民权”、“平等”、“博爱”、“社会契约”、“天赋人权”等,打破了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的一统天下,并对近代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19世纪末的维新派和20世纪初的革命派,就以“天赋人权”的思想为武器,批判过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所宣扬的“君权神授”论和纲常名教,指出“君为臣纲”是纲常名教的核心,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护身符。他们还积极宣传过西方的自由、平等思想,论述了实现自由、平等的天然合理性。其次,是部门文化发生了变化,新的学科体系初步建立起来。传统文化的部门分类粗而简,比如,传统学术就只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著名的《四库全书》就是按此四类编辑而成的。但进入近代以后,尤其是进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后,受西方文化传入的影响,文化的部门分类出现了新变化。一方面,哲学(经学)、史学、文学、语言等一些传统学科或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而逐渐衰落,或接受西方近代文化的影响,变革原有学科内容和体系,从而向现代学科转化;另一方面,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从西方传入的一些新领域和新学科的兴起,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近代文化的体系,特别是儒学的衰落,使其他各门学科摆脱了附庸的地位而获得较大的发展,现代意义上的人文社会科学各门类和自然科学各门类在中国开始初步形成。再次,受西方文化传入的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方式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具有“西式”色彩。比如,过“洋”节,取“洋”名,用“洋”货,坐“洋”车,住“洋”房,尤其是在城市中,西装、西餐、洋酒、洋车已经成为城市居民追求时尚;自主婚姻、征婚启事和西式婚礼也成为城市青

年乐于接受的新生事物。1902年6月26日的《大公报》上的一则征婚广告也透露出人们择偶标准和对结婚礼仪的新要求：“一要天足。二要通晓中西学术门径。三聘嫁仪节悉照文明通例，尽除中国旧有之俗”。<sup>[14](P57-58)</sup>这种新要求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西方新的生活方式对人们观念的深刻影响。

1915年《新青年》的创刊以及因此而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则进一步改变了中国文化的一元结构，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化从一元走向多元的历史进程。一方面，西方文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有了进一步的传播，西方的各种主义、思想、学说、理论、思潮和流派纷至沓来，尤其是民主与科学开始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与此同时，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人文社会科学各门类和自然科学各门类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新的学科体系在原有的基础上基本建立起来。以哲学为例：首先是西方哲学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除马克思主义哲学外，这一时期传入的西方哲学，有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罗素的新实在论哲学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以及一些以前没有受到重视或新近才产生和流行的西方哲学，如黑格尔哲学、弗洛伊德学说，等等。而西方哲学的传播过程，实际上也是中国哲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因为西方哲学的输入，极大地开阔了中国哲学家的视野，他们在翻译介绍西方哲学的同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思想或观念，有的还建立起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并开始用自己的哲学思想、观念和体系解释一些社会、人生问题。但由于他们所属的阶级、阶层、政治立场以及学术背景等诸多方面的不同，他们的哲学思想、观念以及所建立的哲学体系也是不同的，而不同的哲学思想、观念和体系，构成了不同的哲学派别。五四以后中国哲学大致可以分为三大派别，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派别，科学的实证主义哲学派别，人本的形而上学哲学派别。而这三大派别都形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并成了中国多元文化中的重要一元。马克思主义及其学说开始传入中国是在清末民初，先是外国传教士，后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都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作过介绍。但由于当

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束缚下发展缓慢，无产阶级力量还十分弱小，加上封建主义思想的禁锢，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还非常有限，更没有形成思想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是在《新青年》创刊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条件，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又“丰富了新文化运动的内涵，并使之具有了新的发展方向”。<sup>[15](P256)</sup>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以前，或者说在新文化运动的前期，新文化派所理解和要求建立的新文化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但当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后，他们所理解和要求建立的新文化则已是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性质不同的社会主义文化。<sup>[15](P284)</sup>

除了西方文化的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主义文化大规模传入并成为中国多元文化中的重要一元之外，《新青年》创刊对中国文化从一元走向多元的另一重大贡献，即是对儒家思想的批判，否定了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的独尊地位，颠覆了延续两千余年的儒家文化的话语霸权，从而使人们从儒家思想的禁锢中解放了出来，促进了多元思想格局的出现。《新青年》创刊不久，即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孔子及其儒学。《新青年》之所以要批判孔子及其儒学，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儒学的独尊地位不利于人们的思想解放和文化的多元发展。陈独秀在回复俞颂华的信中指出：“孔教为吾国历史上有力之学说，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鄙人皆绝对承认之，而不丝毫疑义。盖秦火以还，百家学绝，汉武独尊儒家，厥后支配中国人心而统一之名，惟孔子而已。以此原因，二千年来迄于今日，政治上、社会上、学术思想上，遂造成如斯之果。设全中国自秦、汉以来，或墨教不废，或百家并立而竞进，则晚周即当欧洲之希腊，吾国历史必与已成者不同。……及今不图根本之革新，仍欲以封建时代宗法社会之孔教统一全国之人心，据已往之成绩推方来之效果，将何以适应生存二十世纪之世界乎？吾人爱国心倘不为爱孔心所排而去，正应以其为历史上有力之学说，正应以其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

而发愤废弃之也。”<sup>[10]</sup>(P674-675)正因为《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对于孔子及其儒学的批判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否定了儒学的独尊地位,因而不仅带来了西方各种主义、思想、观念、学说、思潮和流派的纷至沓来,同时也使中国历史上被儒家视为异端邪学而受到打压的各种主义、思想、观念、学说、思潮和流派又重新活跃于中国的思想文化舞台上。五四时期百家争鸣的出现,就是中国文化从一元走向多元的结果。

多元的文化生态的出现,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历史进步。

### 三、从传统走向现代

进入近代以前的中国文化还是一种传统文化,而不是现代文化,因为它不具有现代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什么是现代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呢?现代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就是民主与科学。而近代以前中国的文化只有民本思想,而无民主思想;只有“格致之学”,而无科学。

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同样肇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魏源、徐继畲等人在他们各自的著作中,以赞赏的态度介绍过西方的民主制度。如魏源就称赞“推择乡官理事,不立王侯”的瑞士,是“西土之桃花源”。<sup>[16]</sup>(P1316)徐继畲推许美国“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的民主制度,是“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sup>[17]</sup>(P291)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将西方的“战舰”“火器”这些科学技术称之为“夷之长技”,主张中国学习,并且对那种视西方的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的观点进行了批驳,他说:“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sup>[18]</sup>(P30-31)西方的科学技术,作为“有用之物”,它利国利民,与“圣人之道”相符合。到了洋务运动期间,介绍西方议会政治、民主政治的著作逐渐增多起来,当时以王韬、郑观应为代表的早期维新思想家把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归结为三种形式,即“君主之制”、“民主之制”和“君民共主之制”,他们认为,君主之制“权偏于上”,君权

过重,民主之制“权偏于下”,民权过重,都不理想,只有君民共主之制“权得其平”,才是中国应该采纳的、最理想的政治制度。<sup>[7]</sup>(P314)与此同时,人们也已认识到了学习西方声、光、电、化等科学技术的必要。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西学》篇中就写道:“泰西之学,派别条分,商政、兵法、造船、制器,以及农、渔、牧、矿诸务,实无一不精,而皆导其源于汽学、光学、化学、电学。”<sup>[7]</sup>(P274)进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后,受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影响,中国人对西方民主与科学的认识和追求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出了“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尤其是严复的“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思想的提出,在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则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主张在推翻清王朝的君主专制统治后,建立起美国式的民主共和制度。与此同时,科学的重要性也为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程虽然肇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但在《新青年》创刊之前,民主与科学是作为一种实现国家富强和救亡图存的工具或手段,而非现代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被人们所认识和追求的。如王韬、郑观应等早期维新思想家之所以要求变中国的“君主之制”为西方的“君民共主之制”,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西方各国,国土不如中国之大,人口不如中国之众,“然而能横于天下者,在乎上下一心,君民共治”;我中国国土之大,人口之多为世界之最,但却屡遭“强邻悍敌”的欺负和侵略,原因就在于“上下之交不通,君民之分不亲,一人秉权于上,而百姓不得参议于下。”<sup>[19]</sup>(P170)因此,中国要抵御外侮,实现富强,其唯一之法,就是西方的“君民共主之制”。甲午战争后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之所以主张兴民权,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西方富强的原因,就在于西方实行的是民主制度,“人人有自主之权”,中国所以贫弱,也就在于中国实行的是封建专制制度,“收人人自立之权,而归诸一人”。既然有无民权,是西方富强、中国贫弱的根源,那么,中国要救亡图存,

实现富强,其不二法门自然是“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20世纪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主张建立美国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由,同样是清朝的封建专制使中国贫弱,而美国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能使中国实现富强。正因为追求民主和科学的目的是为了国家富强和救亡图存,人们在接受或宣传、介绍西方的民主理论和学说时,往往有所选择,而选择的标准则是看某一理论或学说是否对国家富强和救亡图存有利。这就影响了对西方民主思想的完整理解和系统接纳。如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这是西方非常重要的民主思想,有人甚至说它们是民主政治的基石。但在《新青年》创刊、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前,它们则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除严复、梁启超等个别人外,几乎没有其他思想家宣传、介绍过它们。因为这些思想家从国家富强和救亡图存这一目的出发,认为当时中国最需要的不是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而是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自由,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自由,他们(如孙中山)甚至要求限制个人的自由。就是严复和梁启超,他们在宣传、介绍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时,也往往从国家富强和救亡图存的需要出发,对其内容进行过修正。

真正将民主与科学作为现代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加以追求和崇尚的,是《新青年》以及因《新青年》的创刊而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就向国人疾呼:“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sup>[10](P9)</sup>不久,他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又生动地将民主与科学称之为“德先生”与“赛先生”,并明确表示,“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sup>[10](P243)</sup>这样,民主与科学就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

五四新文化运动将民主与科学作为现代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加以追求和崇尚,这不仅体现在它以民主与科学为自己的旗帜上,更体现在它

对民主与科学的认识和理解上。就新文化运动对民主的认识和理解来看,首先,民主是一种个人独立自主的观念。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称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而所谓“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那么,怎样才算“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呢?据陈氏的解释,要有“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意识;“纵横一世,独立不羁”的自主精神;不迷信,不盲从,敢于怀疑的独立思考;勇于进取,敢担干系的负责态度。一句话,“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个自固有之智能。”<sup>[10](P4-5)</sup>胡适又称这种个人独立自主的观念为“健全的个人主义”。其次,民主贯穿于社会各个方面,体现了平等自由的精神。李大钊在《劳动教育问题》一文中曾指出:“现代生活的种种方面都带有 Democracy 的颜色,都沿着 Democracy 的轨辙。政治上有他,经济上也有他;社会上有他,伦理上也有他;教育上有他,宗教上也有他;乃至文学上、艺术上,凡在人类生活中占一部位的东西,靡有不受他支配的。简单一句话, Democracy 就是现代唯一权威,现在的时代就是 Democracy 的时代。”<sup>[20](P291)</sup>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认识 and 理解的科学,不仅仅是科学技术或科学思想,而更是一种广义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种与迷信、盲从、愚昧相对立的崇尚实证的理性精神。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解释科学道:“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sup>[10](P8)</sup>1920年,他又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写道:“我们中国人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向来不认识中国底学问有应受科学洗礼的必要。我们要改去从前的错误,不但应该提倡自然科学,并且研究、说明一切学问(国故也包含在内),都应该严守科学方法,才免得昏天黑地乌烟瘴气的妄想、胡说。”<sup>[21]</sup>

正因为《新青年》以及因《新青年》的创刊而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将民主与科学作为现代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加以追求和崇尚的,再加上这种追求和崇尚又与对封建专制主义、迷信愚昧思想以及旧伦理、旧道德乃至整个传统文化

的批判与反思联系在一起,因而它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推动了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自此以后,民主与科学逐渐深入人心,开始成为一种社会意识或价值观念。如果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还时不时有个人或群体公开跳出来非难民主与科学的话,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则很少有个人或群体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的非难民主与科学了。

将民主与科学作为现代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加以追求和崇尚,从而促进了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这是《新青年》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最伟大的历史功绩。

#### 参考文献:

- [1] 葛兆光. 中国思想史[M]. 第2卷.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 [2] 剑桥中国晚清史[M]. 下卷.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 [3] 马廉颇. 晚清帝国视野下的英国[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 [4] 史策先. 梦余偶钞[J]. 近代史资料,1980,(2).
- [5] 李慈铭. 越缦堂读书记[M]. 北京:中华书局,2006.
- [6] 熊月之. 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 [7] 郑观应集[M]. 上册.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 [8] 徐松荣. 维新派与近代报刊[M]. 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
- [9] 方汉奇. 中国近代报刊史[M]. 上册.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
- [10] 陈独秀. 独秀文存[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 [11] 赵德志. “五四”后西方哲学东渐及其影响的再认识[A]. 载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会编. 中国现代哲学与文化思潮[C]. 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
- [12] 艾思奇文集[M]. 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13]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M]. 第11帙. 杭州:杭州古籍书店,1985.
- [14] 孙燕京. 晚清社会风尚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 [15] 黄楠森,龚书铎,陈先达主编.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C].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
- [16] 魏源. 海国图志[Z]. 卷47. 长沙:岳麓书社,1998.
- [17] 徐继畲. 瀛寰志略[Z]. 卷9.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 [18] 魏源. 海国图志[Z]. 卷2. 长沙:岳麓书社,1998.
- [19] 王韬. 弢园尺牘[Z].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20] 李大钊全集[M]. 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21] 陈独秀. 新文化运动是什么[J]. 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

## Inauguration of “New Youth” and the Trend of Modern Chinese Culture

Zheng Dahua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36)

[Key words] New Youth; modern Chinese; cultural trend

[Abstract] The inauguration of “New Youth” was the inevitable outcome of the trend of modern Chinese culture, and it produce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trend of Chinese modern culture at the same time. In brief, the Chinese modern culture trend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ree aspects. Firstly it is from close to open. Secondly it is from single mode to pluralism. Thirdly it is from traditional to modern. Without the experience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close to open starting from the Opium War there would not be the publication of “New Youth”. Meanwhile, the birth of “New Youth” greatly pushed forward the opening up of the Chinese culture.

[责任编辑 李文苓]